

第七章 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

第一节 与岭南其他地区汉墓的比较

一、与广西其他地区汉墓比较

武帝在岭南设置的9郡，今广西主要分属郁林、苍梧、合浦3郡，其中郁林郡辖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等县；苍梧郡领县中的广信、荔浦、富川、临贺、封阳和猛陵6县在今广西境；合浦郡下辖的合浦（今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等）、朱卢（今玉林、博白县境^[1]）位于广西。余桂东北的阳朔、永福、临桂、灵川、灌阳、兴安、全州、资源等8县及桂林市，以及平乐县、恭城瑶族自治县部分地域属零陵郡；龙胜族自治县属武陵郡；桂西、桂西北的那坡、靖西、西林等地域属牂牁郡^[2]。广西汉墓主要集中在合浦、郁林和苍梧三郡治现今所在地——合浦、贵港和梧州三地（图7-1，广西汉墓分布示意图）。



图7-1 广西汉墓分布图示意图^[3] (1:4300000)

文献记载中的人文地理分区与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4]，广西各地汉墓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与其地理分区基本吻合，依此大致划分为五个区域——即桂北、桂东、桂东南、桂西和以合浦为代表的桂南地区。

(一) 桂北

桂北地区汉墓主要分布在平乐、兴安两县，该地区汉墓是在本地战国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合浦早，发展延续性好，墓葬年代自西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桂北地区西汉墓类型有竖穴窄土坑墓和带斜坡墓道的木椁墓两大类，窄土坑墓不见于合浦。而早、中期部分墓葬底部铺卵石、置腰坑现象较普遍，这些因素应是延续本地战国

时期习俗^[5]，带斜坡墓道的木椁墓则同合浦一致是中原文化经楚地后传入。东汉时期桂北地区有砖木合构墓、无墓道或带墓道的宽土坑墓或木椁墓以及砖室墓，其中土坑墓和木椁墓在该地区流行时间较长，贯穿两汉时期。合浦偶见土坑墓，自西汉中期始至晚期一直流行木椁墓，东汉砖室墓占绝大部分。合浦东汉早期出现的砖木合构墓，贯穿东汉两期，早期如九只岭 M5，晚期有寮尾 M13B 等。这一类型在桂北始见于东汉早期，如平乐银山岭 M117，墓底两侧和后壁铺砌一行青砖^[6]，数量较合浦少。

西汉早期桂北汉墓陶器种类以杯为主，另有瓮、罐、联罐等，如上述，桂北地区杯的形制与合浦早期土墩墓所出完全不同，合浦出土的陶杯直接来自吴越故地。晚期两地出土器类相近，延续瓮罐组合，滑石器和陶井、仓、灶模型明器出现，鼎、盒、壶、仿铜陶礼器组合不完备。由于和楚地相邻，桂北汉墓出土楚式器较合浦多，如兴安西汉早期 M11 出土陶长颈圜底壶、短颈长腹席纹罐、覆钵式盒等带有战国时期楚墓遗风^[7]；柳江县新安出土的滑石面具^[8]与湖南溆浦马田坪西汉晚期墓出土兽面形制相似^[9]；出土的铁釜、釜架、铁削组合^[10]也在楚地常见。东汉时期两地器物种类丰富，陶器组合变化不大，与中原地区汉墓共同点趋多。合浦汉墓常见的珠饰品，在桂北则少见。

（二）桂东

桂东地区汉墓密集区为梧州、贺州及其周边市县，该地区扼湘桂走廊之要道，受中原及楚文化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较有地方特色。土坑墓和木椁墓在本地两汉时期均较为常见，其中西汉早期有无墓道、斜坡墓道、阶梯式墓道三类，西汉晚期至东汉斜坡式墓道增多。西汉早期墓葬多不分室，中期^[11]的贺县金钟一号墓^[12]出现分室，墓室分前后室，下部两侧及后壁有生土二层台，椁室两侧及后部与墓壁空隙以青膏泥填塞，并经夯打、火烘，体现出楚墓的埋葬习俗。合浦前后分室墓则出现于西汉晚期，以膏泥封护的习俗同桂东地区为同源，但出现较晚。东汉时期土坑墓和木椁墓在桂东仍较流行，其中较有特色的是少数东汉时期土坑墓仍设有腰坑^[13]。砖室墓也于本期出现，另贺州钟山^[14]、昭平^[15]等地东汉晚期还发现少量用石灰石构筑的馒头形石室墓。合浦地区发现的土坑墓较少，石室墓在合浦则不见，而合浦东汉时期的砖木合构墓在桂东也没有见到。

西汉早期桂东地区陶器组合既有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瓮、罐、甗、三足盒等组合，也有中原常见的鼎、盒、壶、仿铜陶礼器组合，而仿铜陶礼器组合在合浦出现较晚，始见于西汉晚期，且不完备。西汉中期以来两广各地盛行的井、仓、灶、屋等模型明器和各类珠饰品在该地区出土较少，而井、仓、灶模型明器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合浦未被盗扰的墓葬中较为普遍，大中型墓葬中出土珠饰品的数量也很可观。

（三）桂东南

桂东南地区汉墓主要分布于今贵港（旧贵县）市区周围，南起郁江，北到七里江桥，西起原贵县糖厂，沿风流岭、大公塘、经旧飞机厂，迤东到罗泊湾、南斗村和铁路桥，南

北 2.5 公里，东西 7.5 公里^[16]。

西汉时期贵港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木椁墓两类，部分无墓道，其中少量木椁墓墓道发现外藏椁，如风流岭 M31^[17]，这一形制与同期合浦风门岭 M26 相同。贵港汉墓西汉早期已发展成熟，且受汉、楚等多种文化因素影响，如罗泊湾一号墓^[18]椁内分隔为多厢，椁室四周填膏泥的作法亦为楚墓常见；而椁底设殉人坑、器物坑，墓道设车马坑的形制，则是沿袭中原殷周高级贵族墓的墓制^[19]。西汉晚期贵港以单室的土坑墓和木椁墓为主，合浦则从西汉中期至晚期均流行带斜坡墓道的木椁墓，仅少数无墓道。东汉时期贵港墓葬形制多样前期无墓道的土坑墓以及带墓道的土坑墓和木椁墓仍有发现，另出现砖木合构墓和砖室墓，以砖室墓居多。两地砖室墓形制十分相近，但墓葬用砖尺寸和纹饰略有不同，贵港地区墓砖整体较合浦尺寸大。

贵港作为秦汉时期郡县的治所，开发较合浦早，靠西江这条极为方便的水路，北可达灵渠进湘水，跨长江，可至中原地区，顺流而下可达广州，甚至出海。该地区汉墓形制和随葬器物均表现出与广州汉墓较强的相似性，如东汉晚期贵港同广州均出土有牛车、船、人俑等模型明器，而同期合浦则不见。此外，贵港西汉早期墓显示出较强的越式因素，如罗泊湾汉墓出土有大批属于典型的五岭以北地区的产品，有盖铜鼎、壶、钫、盘、盆、匝、勺、釜、铜镜、带钩，漆耳杯、漆盘、漆奩、木六博、木梳蓖等，还有大量的墨书、烙印、刻划的文字；同时也有铜鼓、盘口鼎、提筒、筒形器，陶三足盒、三足罐、浅腹杯、瓮、罐等越式器。西汉晚期至东汉，贵港和合浦随葬器类大体一致，但也存在差别，如贵港出土的东汉晚期陶牛车和陶船模型，在广州东汉中期均有出现，而合浦则不见。另，贵港汉墓也出土有玻璃器和各类珠饰品，但数量远不及合浦。

（四）桂西

桂西地区在汉代开发较晚，汉墓发现较少，同广西其他各区汉墓不论形制还是出土器物均存在巨大的差异。较为明显的是普驮西汉铜鼓墓，该墓用 4 件铜鼓互相套合作葬具，出土器物包括葬具 400 余件，主要为铜器、玉石和玛瑙，还有铁器和金丝。发掘报告将墓葬出土器物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的早、中期汉墓所出的器物进行对比，发现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断其年代在西汉早期^[20]。

而近年来随着发掘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桂西地区的一些墓葬，年代被重新认识。1977 年田东锅盖岭发现 2 座战国墓，墓坑呈长方形，随葬铜鼓、剑、矛、斧、叉形器，玉玦、玉环和玉管，简报中将这两座墓的年代定为战国晚期^[21]。李龙章将出土器物同云南石寨山等地同类器进行比较，指出锅盖岭 2 座墓年代应晚至西汉中期，同时重新判定西林铜鼓墓年代为西汉晚期^[22]。亦有学者认为西林铜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较合适^[23]。

西林地处云贵高原边缘，普驮铜鼓葬出土器物既有代表汉文化的骑俑、马腿、坐俑、六博棋盘、洗、锅、耳杯、弹丸、弓帽、盖弓帽、车饰、辖、当卢、衔镰、带扣等，亦有

体现云南青铜文化的石寨山型鼓、冷水冲型鼓、羊角钮钟、镯、牌饰等，此外墓中出土的玉环、玛瑙环、玉管、玛瑙扣、玛瑙串珠、玛瑙穿饰、水晶珠、绿松石珠等玉石制品及窄铜格铁剑也多见于云南地区汉墓。以铜鼓为葬具的“二次葬”形式在广西也是首次发现。西林普驮墓因位置靠近云贵高原，汉属牂牁郡，体现出汉文化与云南滇文化两种因素。

田东锅盖岭位于滇越交通要道右江流域中下游，发现的2座墓葬，则体现出本地越文化与云南滇文化交融，但更多体现出越文化，同时受云南滇文化影响。属云南滇文化的器物有石寨山型鼓、一字窄格剑，以及块、环、管等玉器；属两广越文化因素的器物有扁茎剑、直鼻钮矛、长胡戈和叉形器等。

二、与广州汉墓的比较

合浦与广州均是岭南地区汉墓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两地汉墓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由于西汉早期广州为南越国都城，经济繁荣，开发较早，表现为发现的汉墓多，且发展演变轨迹清晰，文化序列完整。自西汉中期后两地交往密切，墓葬形制和器物较相似。

西汉早期广州汉墓有土坑墓、竖穴木椁墓和有墓道竖穴分室（竖穴和椁室均分室）木椁墓三类，以竖穴木椁墓为主，其中土坑墓有窄坑收底墓和直坑墓两类；竖穴木椁墓分有墓道和无墓道两类。合浦依现有材料西汉早期仅发现两处土墩墓，木椁墓形制不明。中期广州汉墓延续早期三型，土坑墓均为直坑；木椁墓以分室墓为主，分室墓形制发生变化，仅在椁室内作分层分室结构。合浦仅发现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西汉晚期广州汉墓不见土坑墓，均为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其中三分之二为分室墓，其中部分出现横前堂。而合浦西汉晚期开始流行带墓道的木椁墓，并发现少量不带墓道的木椁墓，不见广州汉墓的分室结构，亦不见土坑墓。这一时期，合浦一些带墓道的大中型木椁墓带外藏椁，位置在墓道底端或作为耳室位于墓室一侧，而同期广州汉墓中则不见外藏椁形式。外藏椁的使用与否，构成同时期两广汉墓的主要区别，构成了南越国之后两广汉墓出现的一次较大分野。随着东汉砖室墓的兴起，耳室形外藏椁向墓室内转移并以侧室形式出现，墓道底部椁向墓室内转移，以墓室内器物坑形式存在于东汉早期墓葬中^[24]。

东汉早期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在广州和合浦地区均已接近尾声，广州汉墓仍有分室木椁墓，新出现坑底分前后两级的假二层结构。这一时期两地均出现砖室墓，其中广州汉墓有直券顶墓和横直券顶墓两类，直券顶墓有单室、分室和带甬道三类。而合浦东汉早期砖室仅见小型的直券顶墓，形制简单，多为单室，不见甬道。此外，合浦有无墓道和带斜坡墓道的砖圜墓，这类墓葬以木料盖顶或封门。而广州发现的仅是以木封门或铺地板，不见封顶。而这一时期广州出现的横直券顶砖室墓在合浦则不见。东汉晚期广州和合浦均以砖室墓为主，但广州仍有不少木椁墓，而合浦则不见，但偶见土坑墓。穹窿顶合券顶砖室墓和横直券顶合穹窿顶砖室墓在两地均有发现，但这类墓葬在广州出现较早，可至东汉中期，

且数量较多，占三分之二。而合浦则仍以分室、带侧室或甬道的直券顶砖室墓为主，穹窿顶墓和横直券顶墓数量较少。而同期广州出现的双穹窿顶砖室墓，这一形制在合浦则晚至三国。合葬墓于广州汉墓西汉早期出现，多为同穴，亦有少量为异穴合葬；此后同穴合葬出现较多并开始流行；而合浦地区由于其发展的滞后性，两汉时期仍以异穴合葬为主，仅少量为同穴合葬。

广州汉墓西汉早期出土较多越式陶器，有三足盆、提筒、匏壶、温壶、甗、三足罐、三足联罐等，瓮罐组合流行，还有受中原文化影响出现的鼎、盆、壶、钫仿铜陶礼器组合和灶井模型明器组合。瓮罐组合在合浦出现于西汉中期，并同时出现仓灶组合；广州汉墓中期井仓灶屋已较为普遍。西汉晚期，两地随葬器物趋于一致，仿铜陶礼器和越式器数量在广州汉墓中削减，钫已不见，合浦地区西汉晚期仍有钫出土，东汉早期才消失。广州所见的越式陶器在合浦也有少量出土，有瓮、联罐、双耳罐、提筒、匏壶、温壶、簋等，东汉早期瓮、联罐、甗等在广州汉墓已不见，而合浦东汉时期仍有瓮出土。此外，重檐屋、重檐仓、阁楼式陶屋等器物在广州东汉中期已出现，合浦则晚至东汉晚期，而广州汉墓可见的牛车、船、木俑等器物在合浦不见。而合浦自西汉中期、于晚期开始流行的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各类珠饰品，在广州西汉早期墓葬中已有出土。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广州地区由于开发较早，虽受中原汉文化的持续影响，但地方特色仍较浓厚；汉墓自成体系（图7-2，广州汉墓出土器物分期图）。但受外来文化影响程度不同，合浦汉墓自西汉中期兴起后便显示出高度的汉化程度，但同时也因为开发较晚，滞后因素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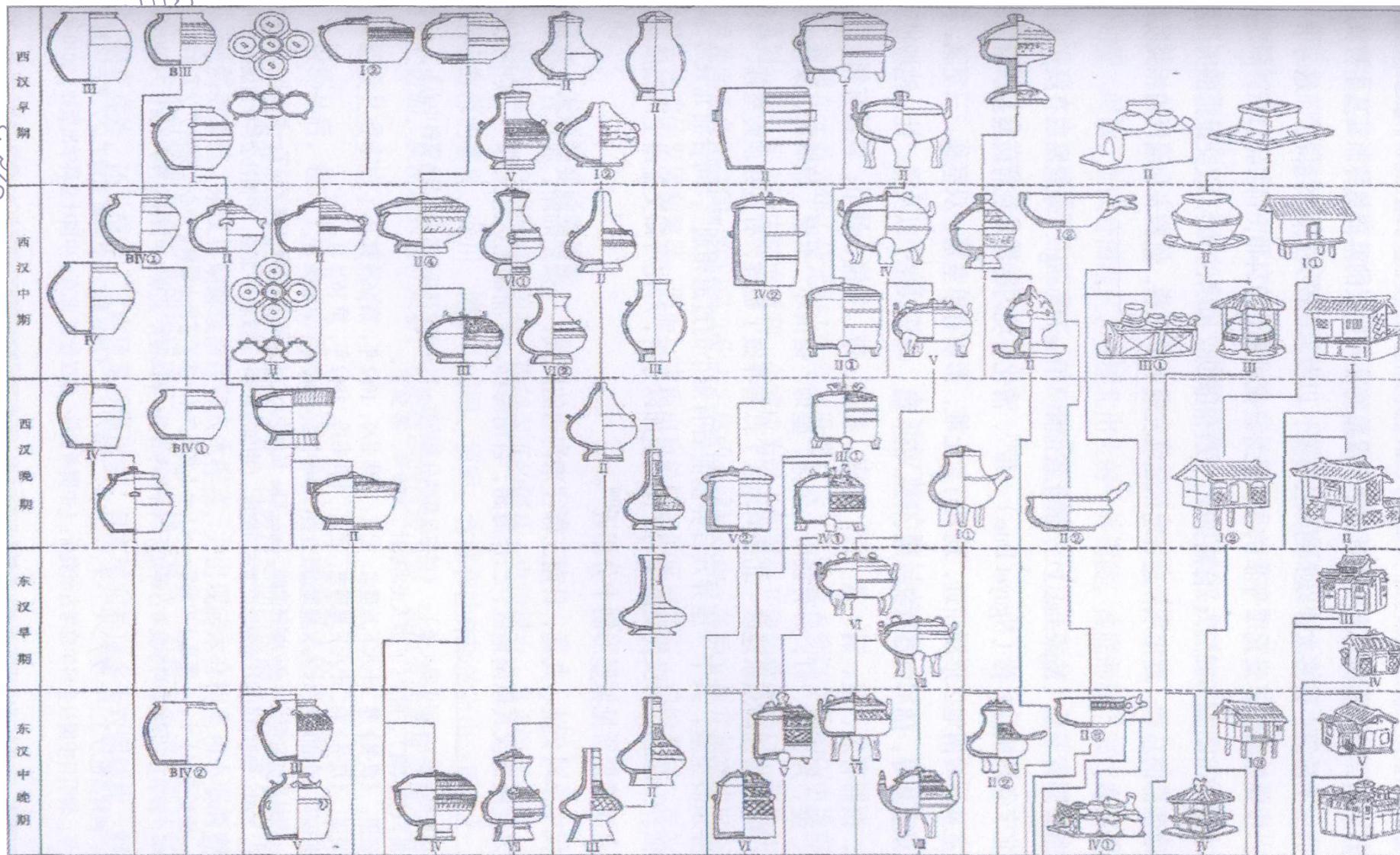


图 7-2 广州汉墓出土器物分期图

三、与越南汉墓的比较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岭南设 9 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 3 郡在今越南北部及中部沿海一带，纳入汉王朝的管辖后，大量汉人和汉文化随之进入这一地区。所谓越南汉墓，是指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方面都具有中国汉墓特征及要素的墓葬总称，其墓主被认为是当时的统治阶级、许多太守以下的郡县官僚，以及流居汉人遗留的墓葬^[25]。这一带人口稠密，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的人口统计，交趾郡户 92440，口 746237^[26]，同期的南海郡才户 9613，口 94253^[27]；合浦更少，仅户 15398，口 78980^[28]，仅交趾郡的人口就超过岭南各郡的总和。近年来，这一地区陆续发现不少汉墓，但发表和编译的相关发掘报告数量不多。

越南海阳省玉乐 (Ngoc Lac)^[29]、清北省邵阳 (Thieu Duong)^[30] 等地发现有汉式木椁墓，在北宁省顺城县月德 (Nguyet Duc) 一带^[31]、清化省境内等地发现有砖室墓。清化发现的砖室墓同岭南地区形制相近，地表有封土堆，形制有单室墓、双室墓、三室墓、横前堂加双室墓等，随葬陶器有瓮、罐、钵、碗、盘、耳杯、虎子以及屋、灶、池塘模型明器等；铜器有鼎、釜、锅、盘、孟、灯座、扣饰、带、钩镜、钱币；铁器有剑、刀、戟、凿、釜、斧、削、钉；另有钱币、金珠、坠饰、银指环、玉璧、琉璃珠、漆器、黛石等^[32]。Henri 将越南东京地区（北部湾地区）古墓葬做了梳理，有直券顶砖室墓、穹窿顶合直券顶砖室墓，其中一座异穴合葬墓前后有短小的过道相通^[33]，同合浦九只岭 M4 形制相似。Catherine 对汉代交趾郡的平民建筑加以分析，对比可知交趾出土陶城堡同广州汉墓东汉晚期所见城堡形制十分相近^[34]。

汉代中原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往来沟通的路线，一条是陆路，通过合浦郡和郁林郡进入交趾郡及其以南地区；二是海路，自南海郡、合浦郡到达这三郡^[35]。其中交趾、九真两郡与合浦和郁林郡相邻，发现的汉墓较日南郡多。日南郡由于较边远，汉王朝或疏于管理，进入该地区的汉人数量远不及其他两郡，故发现的汉墓数量较少。

出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除了越南三郡典型的汉式墓葬外，两地还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合浦和越南均出土有较多玻璃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合浦地区已能从事一定规模的钠铅玻璃珠和钾玻璃制作，不排除向相邻地区输入的可能。汉文化在越南传播范围较广，在越南中部广南发现的沙莹瓮棺葬和南部平阳省发现的铜鼓葬中均发现有西汉时期铜镜^[36]。而本地的东山文化船棺葬中，亦存在汉式器物，如圈足铜碗、铁钺、五铢钱、大泉五十、铜盃、滑石耳杯等，形制同合浦戟中原出土一致。而越南亦有少量器物输入岭南，如汉合浦地区，今浦北出土的一件铜盆，盆底部和下部纹饰同铜鼓鼓面纹饰一致，为翔鹭纹、中间有芒。越南清化也曾发现过这类铜盆，这证实汉交趾地区与合浦地区文化交流十分密切^[37]。

- [1] 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7期。
- [2] 雷肇：《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页。
- [3]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 [4] 徐革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 [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县石马坪汉墓》，《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56页。
- [8] 覃彩銮：《柳江县新安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5页。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67-468页。
-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县石马坪汉墓》，《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38-258页。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金钟一号墓原报告年代为西汉早期，熊昭明在〈岭南地区汉墓〉一节中指出其年代应为西汉中期。）
-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钟山县博物馆：《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钟山县博物馆：《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昭平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页。
-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5页。
- [19] 黄展岳：《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90年第0期，第196页。
-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东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79年第6期。
- [22]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23] 周至清：《浅析广东西林县普驮铜鼓葬》，《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 [24] 熊昭明、谢广维：《广西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外藏椁》，《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86-288页。
- [25] (日) 俵宽司(著)、谢崇安(译)：《越南汉墓的分期研究—以越南北部清化省出土考古资料中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 [26] (汉)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9页。
- [27] (汉)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8页。
- [28] (汉)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0页。
- [29] 原文载：西村昌也。红河デルタの城郭遺跡，Lung Khe 城址をめぐる新認識と問題。東南アジア一歴史と文化。第30号第50頁，2001；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9页。
- [30] 原文载：俵宽司。ベトナム「漢墓」の編年—ベトナム北部タイン木ア省出土資料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考古学。第27号，2007；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9页。
- [31] 原文载：西村昌也。ダエン?ヴァン?ハオ：バツクニン省バイノイ磚室墓の緊急発掘。東南アジア考古学。第25号，2005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9页。

出版社，2010年，第1009页。

[32] 原文载：宫本一夫. ベトナム漢墓ヤンセ資料の再検討. 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館研究紀要. 第97集第123-191頁，2002年；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2页。

[33] Parmentier Henri. Anciens tombeaux au Tonkin. 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17, 1917. 1-32.

[34] Talon-Noppe Catherine. Architecture civile dans la province de Giao chi. In: Arts asiatiques. Tome 38, 1983. 71-77.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3页。

[36] Yamagata Mariko ET AL. WESTERN HAN BRONZE MIRROR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VIET NAM.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21, 2001 (MELAKA PAPERS. VOLUME 5), P99-106.

[37] 梁旭达、覃圣敏：《广西浦北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1期。

第二节 合浦汉墓的区域特征

合浦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郡县后，迅速融入到汉文化的历史进程，并持续发展。籍江河沟通内陆之便利，合浦成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贸易往来于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在以汉文化占主体的合浦社会中，各种文化互相交流融合，共同促进了合浦的发展和繁荣，因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区域特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演变脉络清晰

西汉早期，合浦属南越国辖。南越国下的郡县，史载很少，且多语焉不详，尚可考者有南海郡的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浚阳、含洹和桂林郡的布山、四会^[1]。由于合浦地处边远，从发现的遗存来看，人类活动的遗迹不多，还没有确凿证据显示南越国已在合浦设县或实施了有效统治。

设郡县后，越式土墩墓在合浦还延续一段时间，随着汉人的大量涌入，出现竖穴土坑墓为主的墓葬形制，葬俗产生了明显变化。自西汉中期后段起，流行竖穴木椁墓，大部分带斜坡墓道。东汉早期继续沿用竖穴木椁墓，并出现砖木合构墓和小型的直券顶砖室墓，至东汉晚期，砖室墓的规模增大，构造也趋于复杂，分室有甬道，带耳室、侧室等，除直券外，还见横券，穹窿顶墓逐渐增多，且墓壁和券顶多为双隅结构，整体显得更为结实稳固。土坑墓仅东汉零星发现，应与当地富庶及厚葬之风有关。合葬墓贯穿始终，以异穴合葬为主，鲜见同穴合葬。

随葬陶器除瓮、罐、提筒、簋、带足器等部分器物外，其余多为汉式器。瓮罐和井仓灶模型明器是合浦汉墓自西汉中期起各个阶段比较固定的组合，而具中原特色的仿铜陶礼器则不完整，多仅见鼎、盒、壶，钺较少见。汉越融合的进程，就一般演变规律而言，自西汉晚期起，越文化因素逐渐减少，到东汉晚期，越汉已逐渐趋同，而随着对外贸易往来的增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所加强。东汉晚期出现了高温釉陶，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则几乎没有发现，显示了这一地区陶瓷生产技术相对落后。

二、显示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

随着中原汉人自岭北涌入，强大的汉文化在合浦迅速发展成为主流。合浦在与周边地区和域外的密切交往中，除保留部分越人自身的固有传统外，还受到楚、南越等文化影响，并呈现出浓郁的域外因素。域外因素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讨论，其余越、汉、楚等文化因素，我们分而述之。

（一）越文化因素

先秦至汉，合浦一直是越人的聚居区。“自交陆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2]具体而言，居住在合浦的越人属百越中的骆越。骆越分布“当在左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州地带”，即

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3]在《后汉书》等典籍中，当地越人也被称为“蛮夷”和“乌浒蛮”^[4]。

墓葬出土的越式器主要有瓮、罐、提筒、簋及带足器等，常见陶器组合为瓮罐。从西汉早中期的考古发现来看，本地越人在现合浦县城一带活动，但人口不多。西汉中期合浦始置郡县后，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本地越人逐渐被汉化，墓葬形制、出土器物虽绝大多数为汉式，但一些墓葬的骆越文化特征仍较明显，如2005年文昌塔墓区发掘的6座西汉晚期墓，随葬器物组合主要为瓮罐和壶，出现三足五联罐等典型越式器，M2墓室后壁一侧有三块不规则的石块，这种做法在武鸣马头发掘的先秦墓中有见，经考证族属为骆越人，墓坑积石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5]。马头元龙坡墓地的另一特点是流行碎物葬，合浦汉墓中也有发现，较明确的有近年发掘的西汉晚期墓汽齿厂M9、M11和二炮厂M4，这3座墓葬未经盗掘，保存完好。其中汽齿厂M9和M11随葬陶器多为破碎，部分残块分置几处，距离甚远，应是入葬时有意打破而为之；二炮厂M4出土的1件铜镜，也仅见一小段外缘^[6]。

外来越人墓，明显的是大浪汉城址北面发掘的土墩墓。墓主应为江浙吴越后裔，因战乱或其他因素南迁至此。此外，还应有始见于汉代文献的南越。合浦汉墓的形制及出土的越式器，与广州汉墓所见多较相似，体现出合浦与南越中心地区往来交流的密切^[7]。

（二）汉文化因素

有关汉人南下与越杂居的记载，秦已有之。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8]还有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9]在两汉时期多次平定交趾和海南的叛乱中，也应有部分将士留在合浦当地。

汉王朝向岭南派遣官吏也多见诸于文献，如西汉平帝年间“汉中锡光为交陆太守，教导民夷”^[10]，东汉顺帝时，交趾发生叛乱，遂“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11]，等等。据统计，交州刺史籍贯可考者15人，交州太守籍贯可考者29人，分别来自扬州、荆州、徐州、益州、兖州、豫州等地；都尉可考者3人，交州本土仅有1人。交州最有势力的士燮家族出太守5人，虽云士燮是本土广信人氏，但其籍贯却为鲁国^[12]。因此，合浦汉墓有位至郡县一级的墓主，极大可能是中原王朝派至岭南的汉族官吏，如西汉晚期的望牛岭M1，墓主人应是西汉晚期的郡县高级官吏或地方豪强^[13]，因陶提簋上有“九真府”款，故可能曾任九真郡太守^[14]。再如东汉早期、墓主为徐闻县令陈褒的黄泥岗M1。此外，汉代迁徙合浦的，还多发配之人。从西汉晚期的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到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30年间，《汉书》和《后汉书》中记载的因罪“徙合浦”的，就达10多起^[15]。这些徙合浦的罪人，极少得皇帝的特赦令，回到原籍，如王章弟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后，“白上还章妻子故郡”，王章妻得以返乡^[16]。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只能老死葬于合浦了。

从墓葬形制来看，自西汉中期始，合浦流行带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溯其源流，这类墓葬在中原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东汉早期合浦的直券顶砖室墓，在中原西汉中期已有出现，如洛阳西郊 M3244 的“小砖弧顶墓”^[17]。东汉晚期合浦流行双隅直券顶砖室墓，穹窿顶墓和横直券顶墓的数量也不少。单穹窿顶墓在中原地区出现于东汉早期，双穹窿顶和横前堂砖室墓则出现在东汉中期^[18]，其后在合浦的流行，应是受到了中原同类型墓葬形制的影响。

合浦汉墓出现的一些埋葬习俗，如外藏椁、合葬墓和家族墓，也应是受到了中原汉文化影响所致。外藏椁源于商代后期墓内的壁龛、墓外殉人和车马坑，最晚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形成了外藏椁。合浦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的外藏椁形式与中原相近，位于墓道底端或以耳室形式位于墓室一侧，象征“厨廩”；合葬墓在中原地区，周代已有发现，为异穴或称并穴合葬，战国时期逐渐增多，西汉开始流行，自西汉中期起，中原地区由异穴合葬发展为同穴合葬。从合浦一地来看，两汉时期普遍流行异穴，是由于当地文化发展滞后所致。有学者指出，夫妇同坟异穴合葬是瓯骆独有的葬俗^[19]，但究其源头，仍自中原；东汉中晚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家族葬在合浦也有迹可循，如 1996 年合浦母猪岭发掘的 3 座墓葬，其中 M4 和 M5 并列，M4 出土“黄营”印章，M6 出土“黄良私印”，报告称这片墓地应属黄姓族葬。

除墓葬形制和葬俗外，合浦汉墓出土的陶器、铜器及器物组合也多与中原地区相近。合浦汉墓的陶器主要为瓮罐、仿铜陶礼器和井灶模型组合，其中瓮罐组合为岭南地区常见，后两组同中原地区早些时期的发现一致。随葬的青铜器，研究显示，虽绝大多数应为本地自制，但器物基本源自中原，一些则是直接传入，如风门岭 M26 出土的 1 件铜提梁壶，壶口有焊接修补痕迹，应为墓主心爱之物，此型壶在河南洛阳、汲县、辉县的战国墓中有出土^[20]。扁壶、蒜头壶等一些秦文化的典型器物，也随汉文化南下，出现在合浦汉墓中。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大中型墓葬中还出土有铜、银、滑石、琥珀等各种类材质的私印，印文姓氏多见于今中原地区，如北插江盐堆 M1 “张偃私印”、汽齿厂 M11 “王恭私印”、1992 汽齿厂 M40b “公孙德印”、1996 母猪岭 M6 “黄良私印”、风门岭 M23b “吴茂私印”、黄泥岗 M1 “陈褒”印、1995 第二麻纺厂 M30 “赵（初）君印”等。其墓主人，为南下汉族或其后裔的可能性较大。

（三）楚文化因素

楚地和岭南毗邻，广西北部的五岭之间有两条天然通道与湖南连接，其一自湖南道州入广西贺县（州），另一自湖南静江入广西全州，东汉时还在这些通道上修筑了“峽道”，故两地交流密切。从出土的文物看，早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已随楚人越过南岭山脉传入广西，战国时期增多，并一直延续至汉代。在合浦大量的移民中，应不乏楚人的后裔，他们与越人杂处，从事边疆屯守与开发。

合浦汉墓的部分埋藏习俗，可追溯至楚地。合浦部分西汉晚期的大中型木椁墓，如望牛岭 M1、堂排 M3 和风门岭 M26，其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封护，或周边积沙、积炭用以防潮。这些较为考究的封护方式，在西汉早期的楚地大型墓葬中已比较流行。滑石器最早在湖南长沙战国中期墓出现，西汉初期开始繁荣。西汉晚期，合浦大中型墓中也流行随葬滑石器，如风门岭 M23，1999 年凸鬼岭 M4、M11、M19，堂排 M1 和 M2a 等，其中仅风门岭 M23，就出土滑石器 113 件，占出土器物的一半左右。堂排 M2b 随葬泥质冥钱的习俗在长沙等地的西汉早期墓中已流行。另学者考证，堂排 M1 出土的“劳邑执刼”琥珀印有楚制因素。谭其骧认为“这颗印应为那时的楚国铸以颁赐被封为执刼的朱卢酋长的”^[21]；黄展岳虽认为“朱庐执刼”、“劳邑执刼”两印“可能是南越国自铸的，分别赐给朱庐和劳邑两个地方官的官印，但不排除流徙南越的楚国后人自铸官印的可能性”^[22]。

出自合浦汉墓的一些器物，可在楚地早期墓中找到原型，属楚式器。其一为小口、束颈、鼓腹、大平底的陶罐，在湖北云梦西汉早期墓中已有出现（报告为瓮）^[23]。这类器物，九只岭 M5 出土 3 件（报告为“平底壶”）、寮尾 M16 出土 1 件。另一为球腹圜底罐，二炮厂 M6 出土 1 件，年代为东汉早期，与湖北荆州高台西汉早期墓出土的 A 型 I 式圜底罐，形制相近^[24]。此外，以长沙为中心的“南楚”是楚国玻璃制造的中心地带，合浦发现的璧与长沙地区西汉早期墓所出形制、大小、纹饰均较相似，剑璜也多见于长沙楚墓，经检测分析为成分接近的铅钡玻璃，判断主要为楚地传入^[25]。

（四）域外文化因素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从事商品贸易，也是文化交流和传播之路，一些域外的文化因素，经过模仿改造，植入到本土文化中。这一点，在合浦汉墓及其出土文物中也有较充分的体现。

1. 胡人俑的艺术创作母题

“胡人”通常是指面部特征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的人种。学术界认为“胡人”来自北方、西域和南海诸国等广泛地域，因而各地出土的汉代胡人俑，其服饰、帽饰和容貌也会有所不同。

合浦西汉晚期墓堂排 M1，出土的胡人俑为浅黄色软陶，俑残高 28.2 厘米，其左手、左耳、足部与鼻梁均存不同程度残缺，但造型和主要特征尚可辨识（图 7-3:1）。俑头戴圆顶小帽，身着对襟小领长袍，竖眉小眼，高鼻深目，脸部较圆，络腮胡须^[26]。从俑的外貌观察，其状似舞俑，而怀中所抱，似为弓形竖琴。据国外学者研究，竖琴有两种类型，一为弓形竖琴，二为角形竖琴。丝绸之路繁盛时，使用竖琴的地区彻底分化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使用弓形竖琴的印度，另一个是使用角形竖琴的西方^[27]。

另一件为东汉晚期寮尾 M13b 出土的俑座灯^[28]，灰色硬陶，通高 20 厘米（图 7-3:2）。俑座为胡人形象，深目鼻高，尖下巴，络腮胡。胡人曲膝而坐，左腿横曲，右腿竖曲，右

手撑地，左手举托灯盘，头仰视，造型生动传神。不过，此俑的面相虽明显为胡人，但缠头绾结，又有如汉式的幞头。

广州汉墓中，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墓的很长一个时期，均有俑坐灯和侍俑出土，其胡人的形象，也有与合浦汉墓出土相类，研究者认为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更有可能是来自西亚或非洲东岸^[29]。胡人俑的造型是否能明确源自这些地区，目前还不好定论，但不管如何，“胡人形象的制作，当非无本之木，而应存在现实的写照”^[30]。综观我国发现胡人俑的分布规律，是南方早于北方，沿海早于内地，而在数量上，东南沿海地区远远多于其他地方^[31]。从这一分布规律分析，“胡人”这一外来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国的路径，似应首推海路。合浦出现的胡人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中西海路贸易的扩大，与域外人种交流接触的增多，胡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为时人习见，进而运用，作为艺术创作的母题。



图 7-3 合浦汉墓出土胡人俑
1. 堂排 M1 2. 寮尾 M13b

2. 羽人座铜灯与羽人形象

羽人座铜灯出自九只岭 M6A，年代属东汉晚期。灯通高 35.4 厘米，分灯盘、灯柱和灯座三段。灯盘为行灯的形状，盘圆形、直壁、平底，附三直足和柳叶形把。中段灯柱下为羽人，羽人短脸、浓眉大眼、高鼻大耳、络腮胡须。羽人跨前两侧刻划圆圈，双手覆压，似为把持乐器。双翼紧贴在背后，略为凸出。灯座上作圆形龙首状，龙嘴衔着的小圆柱插进灯盘下面的套管，使灯盘自如转动，底座还铸出龙、虎、熊等瑞兽^[32]（图 7-4）。

羽人是汉代艺术中常见的形象。汉代羽人与先秦羽人不同，大都长着两只高出头顶的大耳，造型大致可见四类：第一类，人首人身，肩背出翼，腿部生羽；第二类，人首鸟身，鸟爪；第三类，鸟（禽）首人身，人身生羽翼；第四类，人首兽身，身生羽翼。四类羽人当中，以第一类出现的频率最高，其他三类皆不多见。羽人常出现的图像组合中，或翱翔于云天，与天帝、雷公、雨师、风伯、电母等天庭诸神济济一堂，或出没于仙庭，与捣药

玉兔、蟾蜍、九尾狐、三足鸟等灵瑞一同陪侍在西王母或东王公周围，或游戏于祥禽瑞兽中，与龙、虎、鹿、朱雀、凤凰、熊罴等祥瑞戏舞，很可能便是在演示既能巩固自身，亦能帮助众生延年益寿甚至不老不死的行气导引之法^[33]。合浦座铜灯上的羽人，大体未脱离学者归纳的汉代羽人范畴，前述铜钹上的羽人属少见的第四类，而这件铜灯座上的，虽属常见的第一类，但也有明显的区别，一是双翼紧贴背后，与其他地区发现飘出的类型不同，二是双耳没有高于头顶，三是双手似持有乐器。

至于汉代羽人形象是否为外来，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徐中舒曰：“羽人、飞兽及操蛇之神，皆为西方最早期，即公元前三四千年来，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印度等地盛行之雕刻、造像或传说。”认为羽人于公元前五世纪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之后进入中国，断言：“画仙人着翼形，必非中国民族固有之想象作风。”且汉代仙人“皆高鼻生羽，高鼻明为伊兰以西之人种，其为外来，尤为显然”^[34]。孙作云的看法则不同，认为羽人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说先秦与两汉羽人图像略异，前者形态原始，后者更富人间情趣，但两者基于同一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皆脱胎于《山海经》，思想根源在于东夷族系的鸟图腾崇拜^[35]。贺西林亦持相似观点，认为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出土的羽人驭凤鸟雕像，是目前所见与汉代羽人最接近的先秦羽人形象，为寻找汉代羽人的直接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表明汉代羽人有可能脱胎于楚文化，与楚羽人一脉相承，其思想则可能源于战国中晚期楚地渐兴的长生久视之道、神仙不死之术^[36]。

我们认为，羽人外来的观点依然很值得重视。合浦发现的羽人形象，与各地所见，有较大的不同，显示出与西方密切的关联性。而且，另一件几乎雷同的羽人座铜灯，在相邻的广西梧州鹤头山东汉晚期墓出土^[37]。合浦郡属交州刺史部，这一时期刺史部的治所就在梧州^[38]。说明此类羽人形象，目前的发现仅仅局限于与海路交往密切的一个很小的区域内。



正面

背面

图 7-4 九只岭 M6a 出土羽人座铜灯（张磊拍摄）

3. 钵生莲花器与佛教传入

发掘于1972年的风门岭M1,是一座横直券顶合穹窿顶砖室墓,年代属东汉晚期末段^[39]。墓葬出土了一件当初被称作“陶灯模型”的器物,分座、把、盘和火焰四部分,通高65.6厘米。灯座作方形,截面呈倒梯形,上宽下窄;灯把作方柱,较高,上有方卯;灯盘敞口折沿,圆形浅腹,中开方孔;火焰部分,略似莲花蕾,上部尖,中间大,底部的方形榫头通过盘中方孔,套入灯把上端的卯口(图7-4:1)。类似器物,合浦还出土有12件,但均属三国时期。另,1999年广东省博物馆还入藏1件,残存座和把部分,高40厘米,标注地点为合浦龙门M3^[40],应为1955~1965年合浦为广东所辖期间出土,器形与三国墓所出相似,年代也应大体相当。这类器物,在此后的晋墓和南朝墓就了无踪迹,说明东汉末年出现后,仅盛行于三国一代,而且就目前的发现,仅限于合浦一地。相较于东汉末期,三国墓出土的器物虽结构基本一致,但变化却很明显,器物变低矮,仅有24~30厘米,部分已简化为无底座,顶部的表现形式也更丰富,一些如前期风门岭M1所出,仅作蕾状,也有些刻出了花瓣形状,还有一些作含苞欲放状,后两者已能大致判断为莲花造型(图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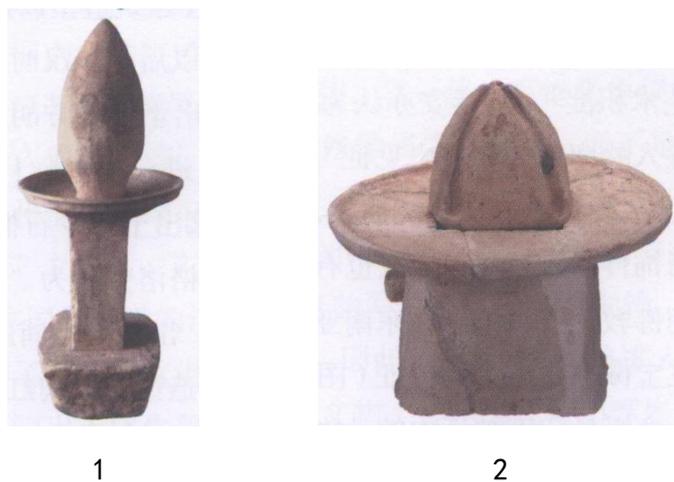


图 7-5 合浦汉墓出土钵生莲花器

1. 风门岭 M1

2. 公务员小区 M8a

之前考虑该器物为灯具,主要是从外形观察,其似具备灯的主要结构,比如灯盘、灯把、灯座等,但若定名为莲花灯,亦隐觉不妥。一些寺庙现存的莲花灯,莲花均盛开作盘状,是作为灯盘用途的。受佛教“钵生莲花”故事及“钵生莲花镜”^[41]的启发,我们把这件器物称为“钵生莲花器”。理由如次:

其一,与铜镜题材上的器物特征基本吻合。上半部分莲花和钵的造型与钵生莲花镜相似。钵生莲花镜有对着钵生莲花下跪作揖的两人形象,如此类推,钵生莲花器也应作为供奉神器,其下半部分作为座足,便于安放和供奉。这类器物出自分室或穹窿顶砖室墓中,墓葬规模比较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也应较高,与佛教进入中国之初先在上层社会传播的诸史实可相呼应^[42]。

其二，器物的出现与研究者们认为佛教传入广西的年代相当。“佛教传入广西的时间，最晚不迟于东汉末年，最早当在西汉晚期。”^[43]东汉末年之说比较确信，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牟子，东汉末年避乱于佛教兴盛的交趾，后牟子返广信定居，潜心研究佛学，最终成就佛教的经典著作《理惑论》。而合浦是广信通交趾的必经之路，且“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两地关系紧密，合浦受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交趾兴盛佛教的影响，实在情理之中。合浦出现的钵生莲花器，也恰好在这一时间段。

其三，佛教文物在合浦有不少发现，零星的出现更早至西汉晚期。李刚把狮、象、鸽子等象征性的动物形象，堆塑器、塔式罐之类的象征性建筑造型以及“托钵僧”俑（或称“俑形灯”）、胡人俑和佛像等，作为佛教文化从战国以后至东汉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流行的艺术积淀^[44]，谢崇安亦认为岭南汉墓中出土的西方胡人形象的人俑艺术造型是南传佛教进入岭南地区的历史见证^[45]。还有学者，进一步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佛教传播之路”^[46]。上述观点或过于笼统抽象，但合浦汉墓出土不少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琥珀等材质的狮形饰件，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较多发现。格洛弗认为“极有可能是早期佛教图像，见证早期佛教思想和价值在东南亚的出现”^[47]。出现在合浦风门岭 M10 的石榴子石摩羯造型和三宝佩也是有力的佐证（图 7-6），摩羯造型还有肉红石髓的，见于凸鬼岭汽齿厂 M16a^[48]。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是法力无边的海兽。摩羯纹饰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在寺院建筑的塔门上尤为多见。现知最早的摩羯纹饰大约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从这时到公元十二世纪，摩羯纹在印度一直流行。它认为传入中国的路线，之前被认为是循西边陆路^[49]。但摩羯纹在陆路出现的时间偏晚，较早的有陕西三原县双盛村隋代李和墓的椁盖上^[50]，之后流行于唐代金银器中^[51]。象征佛、法、僧的三宝佩以及作为法器的铜钹等，也应与佛教有关。可见，出现钵生莲花器之类佛教文物，是完全可能的。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学者伯希和 (P. Pelliot) 就佛教的传入直言：“当纪元一世纪时，云南及缅甸之通道，二世纪时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为佛法输入之所经也”，且“南方教派成立之时，或在北方教派之前。”^[52]但反对者众，甚至提出了“所谓的‘早期佛教的南传系统’的概念不能成立。”^[53]但在南方，考古发现的佛教遗物，特别是东汉及之前的遗存，正逐渐增多，是不争的事实。大量出土熏炉体现的汉人焚香习俗，吴焯认为源自佛家礼仪，而且可能提供了一条目前尚不明朗的、佛教在中国南方早期传播的重要线索^[54]。合浦汉至三国墓中出土这批陶钵生莲花器，“反映出在东汉末期至三国时期，佛教已在合浦地区特别是在中上阶层扎根，并逐渐盛行，人们‘一心向佛’，且通过随葬品的形式，延续到阴间”^[55]；在西南，“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出现和流行在墓葬中的佛像相关图象说明，至少在东汉晚期，佛教已经以某种形式传入中国西南地区”^[56]。三国时期，佛教在吴

地进一步传播，广西贵港出土铜镜上的黄道十二宫巨蟹和宝瓶图像，也是佛教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重要证据^[57]。

在东部沿海，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其年代一直饱受争议。有学者认为，汉代不可能由海上传入佛教造像，孔望山摩崖造像属唐代前后，而不是东汉^[58]。事实上，包括合浦在内的交州地区，与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当时很是顺畅，故有“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之说^[59]。“东冶”即今福州一带，是两汉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冶城的所在地^[60]。何志国所列举的江苏睢宁和盱眙发现的钵生莲花铜镜，说明了当地人对这类佛教故事有所了解和对这类题材的喜好。因此，早期佛教海路进入以及随之的东传，显然并非臆测。合浦出土钵生莲花器等佛教文物，算是为孔望山摩崖造像的“汉代说”提供了一个注脚。



图 7-6 风门岭 M10 出土串饰

1. 石榴子石摩羯佩 2. 8. 玻璃串饰 3-4. 6. 紫水晶串饰 5. 玉髓 7. 紫水晶三宝佩

4. 叠涩穹窿顶的源流

叠涩穹窿顶的特点是下方上圆，在底部正方形的四角出挑数皮砖，形成弧面，再以砖层层出跳的方式成顶。叠涩穹窿顶主要见之于岭南，在广州^[61]、佛山^[62]、合浦^[63]、贵港^[64]以及香港^[65]、越南^[66]等地都有发现。在中原及其他地区，类似叠涩穹窿顶结构仅发现于河南襄城茨沟的 1 座画像石墓，似为孤例，按纪年铭文，为永建七年（132 年）所造^[67]。岭南出现时间则相对较早，年代明确的有广州东汉后期墓中的 M5041、M5065 和 M5068，分别发现“建初元年”（76 年）、“永元九年”（97 年）和“建宁三年（170 年）”的铭文砖。

合浦发现的叠涩穹窿顶汉墓较多，在统计的 110 座东汉晚期墓中，有 20 座^[68]。年代较早的风门岭 M10，呈圆锥形，而稍晚一些的叠涩穹窿顶，如坐落在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一号保护棚内的四方岭 M36，则呈隆圆形（图 7-7）。这种演变，可能与技术的进步有关。三国时期，叠涩穹窿顶不但得以延续，似乎还更为广泛，仅寮尾墓地，25 座三国墓中就有 7 座属此类型。可见，叠涩穹窿顶是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合浦地区盛行的一种墓葬形制。



图 7-7 四方岭 M36 叠涩穹窿顶

研究者较早就注意到了广州汉墓中叠涩穹窿顶的独特之处，指出“这类圆锥形穹窿顶形制较为独特，结构形式是从四方角向内逐层收减成圆锥形；在建筑形式上与洛阳烧沟等地汉墓“四面合顶”的结砌手法不同，除广州、佛山、合浦、贵县外，近邻的湖南、江西、福建未曾见过，其来源关系有待研究”^[69]。常青、徐永利等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常青指出公元前 3~1 世纪世界上同时存在三个比较重要的砖石拱顶系统：一是古罗马系统，二是中亚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系统，三是西汉中叶后我国中原地区出现的砖石拱顶系统，而叠涩穹窿的做法与中亚同类结构完全相同^[70]。徐永利也注意到海上丝绸之路与叠涩穹窿顶的关系，认为这种技术来自域外^[71]。笔者以为，从时间节点和砖结构的结砌技术来看，合浦砖室墓在东汉早期就已出现，其渊源还是出自中原，但至东汉晚期出现叠涩穹窿顶这种造型，应是受到了域外的影响，而这种局部的影响，应是通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故其范围基本限于海路交通便利的两广沿海一带。

三、出土大量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合浦汉墓集中出土了大量的珠饰，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均明显多于国内其他墓群，这不能不说，与合浦港所处的位置及海外贸易直接相关。考古学与科技的初步研究表明，珠饰中的玻璃、石榴子石、琥珀、水晶、绿柱石、玛瑙、肉红石髓、蚀刻石髓和金器，器皿中的玻璃杯和碗，还有香料以及作为非贸易品的波斯陶壶和铜钹等，不少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地区，而汉使团携带前往的“黄金”，或为类似望牛岭 M1 出土的圆形金饼。此外，合浦汉墓还出土有反映域外文化因素植入的本地器物，如胡人陶俑、羽人铜座灯、陶钵生莲花器等。

东南亚、南亚地区的珠饰有相当部分出自遗址，且在遗址中显示出当地加工的迹象，

而在合浦，几乎都是从墓葬出土^[72]。

这部分内容，我们将放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1]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117页。

[2]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9页。

[3]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百越民族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7-230页。

[4] (宋)范曄：《后汉书》卷五、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5、340页。

[5]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年第12期。

[6]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5-76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八章第十一节“岭南地区汉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2-491页。

[8] (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9] (汉)司马迁：《史记·淮南王传》卷一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86页。

[10] (南朝)范曄：《后汉书·循吏列传》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2页。

[11] (南朝)范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8-2839页。

[12]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271页；秦佳：《两汉交州官吏及相关人物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4-22页。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14] 蒋廷瑜：《汉代篆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8期。

[15] 蒋廷瑜：《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

[16] (汉)班固：《汉书·王章传》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39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18]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5页。

[19] 蓝日勇：《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21] 谭其骧：《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地理》1989年第6期。

[22] 黄展岳：《“朱庐执刳”印和“劳邑执刳”——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

[23] 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2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25] 熊昭明、李青会：《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页。

[2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27] 劳沃格林著，方建军、林达译：《丝绸之路乐器考》，《交响》2004年第3期。这是作者2003年9月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APSE)学术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28]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78页。

- [30] 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68页。
- [31] 李刚：《汉晋胡俑及佛教初传中国摭遗》，《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报告中描述“底座制成三勇士各骑怪兽飞跃奔腾纹饰”，近期清理锈斑后观察，发现有误。
- [33] 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2010年第7期。
- [34] 转引自[33]。原文《古代狩猎图象考》，载《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第292、284、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原文撰于1933年。
- [35] 转引自贺西林前文。原文《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载《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1-641页。原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期。
- [36] 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2010年第7期。
- [37] 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文中提到大圹4号墓出土1件羽人铜座灯，但在《广西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还提到2号墓亦出土的1件铜灯（《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及尺寸与前述一致。经与发掘者李乃贤先生核实，为同一件器物。
- [38]（南朝）范晔：《后汉书·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33页。引王范《交广春秋》曰：“交州治羸娄县，元封五年（前106）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210年）治番禺县”。
-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148页。
- [40] 广东省博物馆提供资料。
- [41] 何志国：《钵生莲花镜考》，《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
- [42] 相关史实可参见鎌田茂雄著，郑彭年译，力生校：《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 [43] 陈波江：《佛教传入广西时间考》，《学术论坛》1995年第5期。
- [44] 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 [45] 谢崇安：《岭南汉墓所见之胡人艺术形象及相关问题》，《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 [46] 李庆新：《唐代南海交通与佛教交流》，《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 [47] Ian C. Clover. 1989.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 link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 Trading System.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Occasional Paper, No. 16. pp. 1-45.
- [48] 该墓由合浦县博物馆发掘于1992年12月，同墓出土铜斧、四乳规矩铜镜和大泉五十铜钱各1，可知年代不早于西汉晚期。
- [49] 岑蕊：《摩羯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 [5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1。
- [51] 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2。
- [52] 伯希和(P. Pelliot)：《牟子考》，载冯承钧编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五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60-183页。原作发表于1920年。
- [53] 姚崇新：《佛教海道传入说、滇缅道传入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荣新江、朱玉麒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459-496页。
- [54] 吴焯：《汉代人焚香为佛家礼仪说——兼论佛教在中国南方的早期传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 [55]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浦县文物管理局：《2009~2013年度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53-354页。
- [56] 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与画像墓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38-139页。

- [57] 王煜、王欢：《三国时期吴地黄道十二宫图像试探》，《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4期。
- [58] 阮荣春：《孔望山佛教造像时代考辨》，《考古》1985年第1期。
- [59] (南朝) 范晔：《后汉书·郑弘传》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6页。
- [60] 吴春明：《闽越冶城地望的历史考古问题》，《考古》2000年11期。
-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68-375页。
- [62]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
- [6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第10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广西合浦县禁山七星堆东汉墓葬》，《考古》2004年第4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风门岭汉墓—2003~2005年发掘报告》附录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148页；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寮尾东汉三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 [6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年第3期；《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广西贵港市孔屋岭东汉墓》，《考古》2005年第11期；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贵港市博物馆：《广西贵港马鞍山、梁君垌汉至南朝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1期。
- [65] 白云翔：《香港李郑屋汉墓的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97年第6期。
- [66] Parmentier, H. 1917. Anciens tombeaux au Tonk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17. pp. 1-32.
- [6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 [68] 统计数字来自合浦汉墓上述报告。1987-1988年发掘的文昌塔汉墓，因来说明墓顶形式而未列入。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79页。
- [70] 常青：《两汉砖石拱顶建筑探源》，《白然科学研究》1991年第3期。
- [71] 徐永利：《汉地砖砌穹窿起源刍议》，《建筑学报》2012年第S1期。
- [72] 仅在草鞋村汉城址的扰土层中发现六方体白水晶1颗。参见：《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